

#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国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李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善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环资委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主编助理:何超

第75期(总第188期) 2014年11月16日 星期日 甲午年 闰九月二十四 投稿邮箱:jix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 新型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

■ 任玉岭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理事

### 一、新型城市化道路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新型城市化就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同时也是更注重城市发展质量和重视城市生态化、智能化建设的城市化。

新型城市化是针对过去30多年城市化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的,而首先是针对城市化“不以人为本”的路径提出的。我们的城市聚集了2亿多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却不能享受市民待遇,更不能在城市有住房、有家庭,致使中国的数以千万计的家庭,家不成家,夫妻长期不能相见,儿女不能与父母团聚,农村留守儿童高达5800万之巨,农村的很多老人缺乏依靠,无人照顾。这虽然不同于人们经常形容的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惨状,但在实质上原先的城市化引发的后果,对农民工的生活来说是有相似之处的。

为了解决我们的城市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从人道主义出发,立足于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决心扭转城市化不以人为本的问题和弊端。这不仅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所决定的,也是推进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不可缺少的。

正如列宁所言“城市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总结世界上200多年快速发展的经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世界的进步是与城市化的推进相伴的。1800年至1980年的180年中,世界人口增长3.5倍,而城市人口却增长35倍,城市人口增长比总人口增长高出10倍以上。这180年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直接相关。历史证明,凡是发达的国家都是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几乎都降到5%以下,美国2.44%,德国2.89%,英国1.9%,法国3.89%,荷兰3.7%,澳大利亚4.83%,以色列3.08%,日本4.78%,意大利6.16%,新西兰9.17%,韩国10.5%,新加坡0.2%,我国台湾9%。韩国与我国台湾,现代化起步较迟,80年代农民占比仍然偏高,而至上世纪末,他们也分别降到5%以下。

城市化所以能够带动现代化,其关键在于城市化可以促进劳动分工,促进创新,促进交流和碰撞,从而能够根本转变绝大多数农民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效劳动,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恩格斯讲过:“伦敦因为聚集了250万人,使每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00倍。”城市越大,分工越细,第三产业越发达,就业岗位越充足。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越大搬进去越有利。”

我国从一个文明古国和康乾盛世,逐步走向衰落和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其根本原因就是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我们的国家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特别是城市化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后面。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1948年的城市化率只有28%,但由于重视了城市化,1958年就达到60%,这为后来日本的快速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而我国不仅在城市化方面设置了很多门槛,而且在1961年和1979年,推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干部工人的下放农村和数千万城市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大运动,严重抑制了我国的城市发展。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还不及日本1948年的水平,同日本相差60个百分点。上世纪80年代,为推进城市化,实行了大面积的地改市,由于思想的解放,城市化率提到32—33%。但进入九十年代,过分的稳定压倒一切,加上户籍制度的制约和为防止贫民窟在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拆掉了城市周边的浙江村,河南村等等。在此严格的管理之下,进入新世纪之初我国的城市化仍只有33%左右,同工业化水平相差甚远。在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大声疾呼下,有关方面于2001年,改变了城市人口统计方法,一下子把城市化率提高到46%以上,并且说:“城市化率高达一年一个百分点。”这虽然安顿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情绪,但却给我国的城市化带来了灾难——一方面高楼化、亮化、绿化、美化把城市的地价、房价抬的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在虚假的城市化率掩盖下,使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难。直至去年,我们的总理讲话,才道出我们的真正城市化率只有36%。这同世界城市化90%的水平相比相差24个百分点,同发达国家60%以上的城市化率相比,相差40至50个百分点。因此,我国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路径和必然选择。

### 二、新型城市化面临的发展新机遇



●任玉岭(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理事)

#### (一)城市化滞后和农村人口众多带给城市化的机遇。

迄今为止,我国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农业产值已降至GDP总量的10%以下,但城市化率才仅为36%,农村人口还高达64%。最近虽然取消了户籍的二元结构,但这64%农业人口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状况仍没有大的改变,同城市人口相比,他们的生活条件仍然明显偏低。广大农村人口虽然对进城当市民望而生畏,望城兴叹,但他们仍然把进城当市民作为改变命运和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特别是农民工的第二代和新生代的年轻农民概莫能外。如果城市能够向他们提供廉租房,且能够在适当期限内保证他们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权益不变情况下,绝大部分农民入城的积极性肯定是很高的。

暂不考虑农民工携父母入城,现在2亿多农民工,如果有半数人入城就是1亿人,这就已经随农民工入城的2000万农民工子女和5800万留守儿童,需入城的总人口将不少于17800万。按此人口设城的话,以100万人的城市计,需新增城市178个。如果按照现代化的要求,不要说把农村总人口降到现代化国家10%以下的比例了,就是按农村人口保留20%计,我们也还要有44%的人口到城市落户,这44%,实际人口数应为5.94亿人,按此人口数量设城的话,需增加594个100万人的大城市。倘若2049年全面实现现代化,也仅有35年的时光,在此期间,有必要把农村人口总数量降至20%,这样每年将需有1700万农民变市民。由此看出,新型城市化的任务是紧迫的,同样说明中国的城市化的机遇是极大的,驱动力是极强的。

#### (二)促进共同富裕,推进城乡统筹带给城市化的机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共十八大,特别明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实行共同富裕;中央提出的八个必须坚持中,“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必须坚持共同富裕”这两条是最新提出的。新一届政府,为了确保执政为民的方针落到实处,正在从各个方面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以GDP论英雄,坚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政府大力节约开支,国企管理人员减少职务消费等等措施,以及正在进行的反享乐主义、反奢靡之风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深入反腐等,可以说都是围绕广大人民的利益更好实现进行的。中央在大力推进的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的户籍并轨,同样也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中国农民人均土地十分有限,如不能离开土地,向城市转移,难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致富也就成为无源之水。世界劳工组织曾经对城乡差距较大的47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城乡差距超过2的国家有3个,我国是其中之一,我们的城乡差已经达到3.2左右——有人按社会购买力分析,认为这种差别高达5。城乡差别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城市化。世界上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城市化率都达到60%左右,日本、韩国都达到85%以上,从事农业的人口降到5%以下。发达国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在日本、韩国城乡差距不是市民收入高过农民,而是农民收入高过市民10%左右。他们就是靠分流和减少农民,靠农民的市民化。因此,我们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好广大农民的致富问题。中央关于城乡统筹的政策,一方面是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使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均等化,二是提升农村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水平更好

新型城市化中农民最难以承受的是城市房价的无限高企,严重地脱离了农民和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房价过高和农民收入过低形成了巨大差距,这就像一道闸门一样,把广大农民拒之城外,使农民和农民工望城生畏。很多农民和农民工之所以不愿进城,这才是根本原因。

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使他们不断增强融入城市的能力,进而推进城市化和城郊市镇的崛起。

#### (三)海陆空交通大发展带给城市化的机遇。

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自始至终与交通紧密相关。最早的城市多是河海码头促成的,今日的大都市都是靠海陆空交通优势提升的。我国近20年,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海陆空交通大发展,迄今我们已有建成铁路10万公里,公路423.75万公里,高速公路9.62万公里,高速铁路1.2万公里。另外,在沿海、沿江建起了数百个港口码头,在东中西部建起机场上百个,所有这些交通设施的建设,都为城市建设和兴起创造了重要条件。

80年代末,组织上派我去北海市担任副市长,当时由北京到南宁要坐38个小时的火车,南宁到北海还需坐7个小时的汽车。后来,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开通了那里的民航机,高速公路,铁路及海上的轮船后,情况发生了迅速改变,现在的北海已成为GDP近千亿元,财政收入过百亿,人口近百万的大城市。我最近到河北涿源县去考察,那里离北京240公里,坐火车要穿越122个山洞,像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交通改善就很难发展,而今铁路和高速公路贯通后,这里的旅游迅速热了起来,中美科技产业园也即将在这里落户。又例如重庆西部的璧山县,过去山高路险,很难发展,而今仅通往重庆的高速路就有3条,高速城铁也在推进,恰是交通的改善已使这个仅有60万人的小县,GDP达到数百亿元,财政收入达60亿元,一座美丽的卫星城正在迅速崛起。现在中国已有很多地方在交通条件方面出现了重大转机,这些地方的城市化必将迎来大发展。

#### (四)让三个一亿人入城和丝路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带来的机遇。

作为近期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最大机遇,莫过于三个一亿人入城和丝路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决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了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三个一亿人入城重大战略。这三个一亿人,一是要让一亿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二是要使棚铺区居住的一亿工矿企业、农场、林场员工的居住条件根本改善,三是要在中西部让一亿农民在当地转为市民。这三个一亿人的市民化问题的解决,必然会实实在在地把我国的城市化大大推进一步,使城市人口总量接近8亿或更高。

为了落实好三个一亿人的城市化战略举措,一是统一了城乡户籍,并在部分特大或超大城市实行积分落户。二是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棚铺区改造,不仅在这方面加大了投入,也加快了进度。在对一些农场、林场、矿区的棚铺进行改造时,一般都注意向城市靠拢,实行非市民向市民的转变。三是在中西部新设一批新城开发区,如兰州新城的建设、咸西新区的建设、贵安新区的建设和郑州航空实验区的建设,都是规模较大,气势恢宏的新城区,它们将作为在中西部吸纳1亿入城进城龙头工程,促中西部城市化迈向更新台阶。

再就是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提出,这不仅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而且会极大地提升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尤其是会对河南、陕西、宁夏、甘肃、新疆以及长江两岸的城市化产生重要的推进。

#### (五)国有和民营企业实力的增强带给城市化的机遇。

新型城市化,要吸引人,就要有就业岗位。要创造就业岗位,就要有企业的投资和建

设。美国历史学家Davisland讲过“有钱才能赚钱”,对于城市发展来说,钱也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近60万亿元,国家的实力,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根基。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其数量之大,世界少有。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的集中地,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如此众多的企业种类和庞大的企业群体,将成为推进城市化的中坚力量。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企业投资沿海各省,大大促进了沿海城市化的推进。广东、山东、江苏是企业投资最多的省份,也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前三强,同时在城市建设方面,无论其数量和规模都位于中国的前三位。现在随着沿海地带土地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企业正在向内地转移或是在内地扩张发展,这必将会助推中西部城市发展。例如,富士康前几年走向河南郑州后,不仅全面带动了河南的电子产业,而且也迅速提升了河南的对外贸易。

今天,我们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已达100家之多。数以万计的国企、民企、上市公司、外资企业的迅速增长,都为城市化的推进创造了良机。去年国务院决定降低公司成立门槛后,公司的增长率提升27%,服务业、旅游业、物流、快递等的迅速增长,也一定会成为新型城市化的又一动力。

### 三、新型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 (一)观念误区和思想不解放带来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化没有“以人为本”,不重视农民变市民,其根本原因是观念误区和思想不解放造成的。而今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恐怕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和挑战仍然还是这一点。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对“贫民窟”的认识问题。很多学者包括一些城管与治安管理部门,一直以来总是把中国城市化没有出现贫民窟作为一大业绩来赞颂。可又有谁思考过我们为了抑制贫民窟,在城市中铲除大量的农民村,究竟给我们的城市化带来多大危害呢?今天我们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已过7000美元,但我们的真正的城市化率仅有36%,同发达国家差约50个百分点,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根据我的了解,所谓贫民窟,就是在城市化初期,大量农民走进城市,自找工作,自建住房形成的居住区。我们国家因为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怕农民工扰乱城市发展,所以严格限制了农民到城市自建。开放初期,北京出现的浙江村、河南村等等,都被强令拆除。但是,这不等于没有贫民窟,我们不少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比贫民窟还贫民窟。不久前,北京报道的一套80平米的住房中,住着28个人的租房户,这难道不是对“没有贫民窟”的极大讽刺吗?

我198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时,一位大学校长为我开车,当我问及他斯德哥尔摩贫民窟的情况时,他指着一片新城说,贫民窟都已变成了高楼大厦,那些贫民也已成了这些高楼大厦中的员工了。最近我到土耳其去,在安卡拉古城上,导游指着城下大片的黄瓦绿树的居民区对我说,那就是当年的贫民窟。最早那里没马路,没树木,后来城市发展了,政府给他们修了路、植了树,俨然变成了美丽的新社区。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看,包括当年的伦敦都是有“贫民窟”的出现的,“贫民窟”加速了城市发展,加速了农民的市民化。中国恰恰因为限制了和大量拆除了农民村,而致只有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见有农民变市民的转变。

考虑到“贫民窟”是农民变市民的便捷途径,让农民在城市自建有利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我曾于20年前就向一些欠发达的城市建议,划出一些土地,搞好住房规划,给出一些图纸,让农民到城市自建,这样不仅有利于城市的成长壮大,更利于农民变市民。至今为止,我仍认为这仍不失为一种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好办法,它不仅减轻了国家对城市化的负担,而且也可以大量减少农民工把仅有的收入投放到老家去,盖一些大量闲置房。浙江苍南县的龙港镇,实际上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农民在那里聚集后,逐渐兴起的而今已成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的中等新城。鉴于我国城市化任务还十分艰巨,国家又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情况下,我认为,应该破除贫民窟的恐怖病,借鉴龙港兴起的经验,在要发展的城市内专门划出一些片区,吸纳农民和农民工按照规划和图纸在这些地方自建。经济的发展,是靠人口聚集创造需求的,也是靠人口聚集创造就业岗位。我们应该解放思想,促进人口聚集,为农民进城想出新办法,拓宽新路子。(下转02版)

## 管益忻主编同海尔CEO张瑞敏对话

■ 刘立华

11月10日,在APEC会议召开期间,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新经济新产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本报主编管益忻教授同企业管理大师、海尔集团CEO张瑞敏进行了深度对话,双方就当前热点问题交换了彼此看法。

两人的对话内容涉及第三次工业(制造业)革命、全球价值链、资本运作、安德森创客、大数据运用等几方面。管益忻教授认为,

作为东道主,APEC的举办给我们打开了空前广阔的大视野,以下三个战略聚焦点必须找好:第一,以制造“制造产品的机器”为王的超级制造业正在成为主流;第二,打造以我为链主之全球价值链正在成为我国全球战略发展的主导环节;第三,洞察并把握市场背后资本价值(观)驱动为源泉的创新驱动机制是我们开辟新未来的活力源泉。

这是一次经济前沿理论与企业实战的大碰撞,有许多新观点值得期待,本报将择期披露相关对话实录以飨读者。

## 本报第二届“(2014)中国经济学人”评选启动

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报拟在“2013·中国经济学人”评选活动基础上举办第二届“(2014)中国经济学人”评选,自2014年11月2日起正式启动。参评者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其理论具有原创性、实践性、时效性、前瞻性和首发性;在本报至少发表过一篇论文;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欢迎具备条件者踊跃

参评。新送参评(参考)作品请发至本报投稿信箱,来稿请注明“参评参考作品”。邮寄作品请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6号东一区一号楼113室,邮编100081。参评稿收稿截止日期(以发送日期和邮戳日期为准):2015年1月15日。

经济学家周报专家委员会  
2014.11.2

## 经济学家周报“2014·经济学人评选”基本规则

- 1、成为“经济学人”的基本条件是:  
其一,原创能力强,学术水平高;其二,理论实践性强,甚具可操作性;其三,应用时效性强,社会影响力广泛而深远。
- 2、本评选系整体评价个别“经济学人”,而不只是哪一(几)部(篇)论著或哪一(几)个别观点、论点。
- 3、关照各个学术流派,各个领域。学者:老、中、小兼顾,文论:长、中、短皆宜。
- 4、不搞“终身制”,一年一届,随时上车,随时下车。
- 5、本次评选纯系公益活动,不收任何

- 费用,也不设任何奖项。
- 6、人数设定:“年度人物”,十名;入围者,30名。
- 7、入选条件以披露规则为准,保留最终解释权。
- 8、本次活动完全匿名进行,不公开评委会、专家名单。
- 9、本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名单揭晓以本报公开披露为准。

《经济学家周报》  
2014.11.2